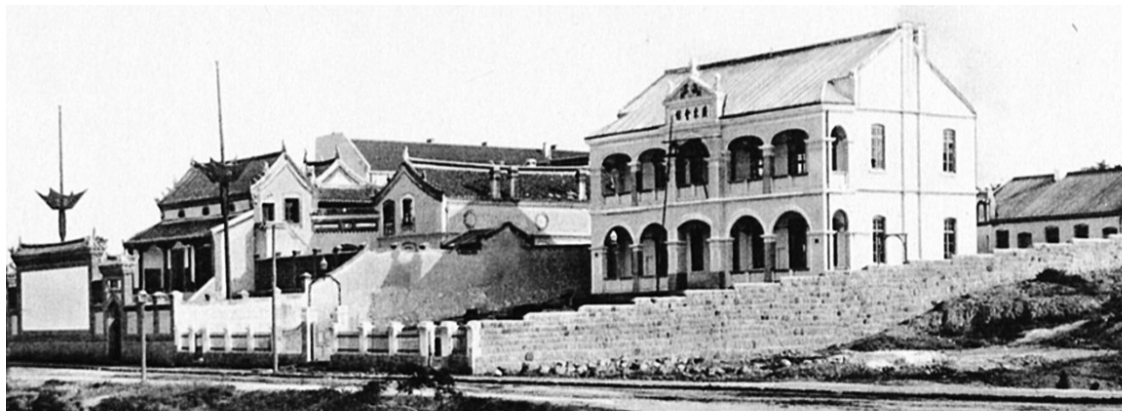
孙中山在广东会馆与粤商合影。



1910年的三江会馆(左)和广东会馆(右)。

二十世纪初 青岛商帮的财富往事

■ 潘磊

“头戴盛锡福,脚踏新盛泰,手戴亨得利……”这段老青岛人朗朗上口的顺口溜,是青岛城市记忆中的辉煌一瞥,帮我们回忆起那些曾在青岛商界独占一方的老字号们。

老字号的背后,是20世纪初在青岛扎根立足的商人群体。他们来自中国的天南海北,以同乡为纽带在青岛形成一个个实力庞大的商业团体。

动荡乱世,商海沉浮。旧时青岛的各大商帮见证了青岛城市的成长,他们在商海中睥睨天下,于乱世里纵横捭阖,书写了一段激荡的往事。

财富新热土 岛城商界“三足鼎立”

19世纪末,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给清王朝造成了严重的海疆危机,清廷在组建近代海军的同时加强了沿海各口岸的防备力量。1891年,清廷命章高元率四营清兵移防胶澳,青岛建置自此开始。

截至1897年,青岛口仍是一个传统经济为主的地区,据同年出版的《海云堂随记》记载“本口原有商铺四十九,今为六十五家……一荒陋渔村,一变而为小市镇”。1897年,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中两名传教士被杀,悍然出兵胶州湾地区,次年中德签订《胶澳租界条约》,德国强租胶州湾。

随着德国宣布青岛作为自由港对全世界开放,外地商人循着商机纷纷来到青岛,其中尤以山东商人为甚。地理邻近青岛的胶东各县是在青山东商人的主要来源地,形成了黄县(今龙口)、掖县(今莱州)、即墨三个主要山东商人群体。

20世纪初,黄县商帮是在青山东商人中实力最强的,通过振昌德、东兴祥等商号垄断了青岛的纱布产业,在杂货、印染等行业黄县帮也有较强影响。黄县帮地位的奠定,离不开其灵魂人物——傅炳昭。

傅炳昭1865年生于黄县,早年赴南洋商业考察,还曾在日本经商。青岛建置后傅炳昭来到青岛,在总兵衙门(今人民会堂)附近开办源泰商号经营杂货。德国强租青岛后,傅炳昭自学德语并在大鲍岛开设祥泰商号,为德国洋行充当中间商,通过采购土产并推销五金洋货积累了大量财富。凭借着经济实力,傅炳昭逐渐成为青岛商界的头面人物之一,曾协助推进胶济铁路建设。

另外,以济南章丘孟氏兄弟(谦祥益、瑞蚨祥的创办人)、即墨陈氏、湖岛的胡存约等人也是山东商帮里的重量级角色。1902年,傅炳昭、胡存约等人组织山东籍商人成立山东会馆,山东商人群体在当时的青岛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。

除了山东商帮,“三江”商帮是青岛的另一重要商人群体。清初设立江南省(后分为江苏、安徽两省),与江西并称两江。

青岛开埠后,大批两江三省商人来到青岛,他们与在青浙江商人构成了三江商帮。其代表人物丁敬臣、周宝山等人在1905年成立了三江会馆,维护苏皖浙赣四省在青商人利益。丁敬臣是江苏扬州人,因掌握外语且熟悉洋务,于1900年被德国禅臣洋行青岛分行(今馆陶路5号)聘为买办。此后他开办悦来、丁敬记、悦升煤矿等公司,经营煤炭、进出口贸易、航运业、旅店业等。商业上的成功让丁敬臣深受德国统治当局重视,成为青岛三江商帮的领袖人物之一。

除了山东商帮、三江商帮,青岛的财富热土上自然少不了商业嗅觉敏锐的广东商人。最早一批粤商在1900年前后来到青岛,粤商主营是为南方代购山东土产、代销洋货,著名商号有景昌隆、广有隆等。

随着粤商数量增多,1906年大成栈(位于潍县路)经理古成章与何永生、莫季樵(怡和洋行、太古洋行青岛分行的买办)等人成立了青岛广东会馆,负责向在青粤人提供帮助。之后,春和楼的所有者、天津商人朱子兴带领河北籍商人加入山东会馆,进而形成了齐燕会馆。同年,三江会馆、广东会馆(均位于今四方路10号)馆舍相继建成,胶澳总督都沛禄、清朝山东巡抚杨士骧出席落成典礼。齐燕、三江、广东三大商帮“三足鼎立”的局面正式形成。

竞争与合作 闯青岛的商帮和同乡会

青岛开埠后,经济快速发展。强租青岛的德国人管控能力有限,不得不倚重在青岛极具影响力的商帮承担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。

为了捍卫华商利益,各大商帮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德国人。傅炳昭等人就联合其他商帮抵制德国人拆迁天后宫,最终保住了这座寄托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建筑。

在青商人于1902年成立中华商务总局,设董事12人,其中山东籍6人、外省籍3人、洋行买办3人。傅炳昭、古成章均为该局董事。

1908年,德国统治当局提高了华商在港口卸货的缴费标准。中华商务总局组织了大规模抵制德货和罢市运动,德国人最终妥协。

随着华商实力的壮大,1910年,青岛商务总会取代了中华商务总局,傅炳昭出任首任会长。

德国人任命青岛商务总会中的四名华商担任“预备参议”,此时三大会馆已经成型,根据各商会影响力最终规定齐燕会馆2人、三江会馆、广东会馆各1人担任参议。

各商帮在竞争的同时也注重合作,例如,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购入博山路——海泊路地块进行开发。之后,古成章将该地段转售给三江会馆会长、周锐记经理周宝山(浙江慈溪人),周宝山在此盖起了多座里院建筑,其中就包括如今网红打卡地——广兴里。

1912年9月,三大会馆联合青岛各界邀请孙中山来青,三江会馆副会长丁敬臣在三江会馆用青岛啤酒接待了孙中山。当晚孙中山又来到广东会馆,与香山县老乡、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畅谈时局。邀请孙中山访青体现了青岛商人的爱国热忱,鼓舞了青岛人民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。

1914年,日本击败德国强占青岛。1916年,青岛商务总会改组为青岛总商会,会董32人, 在会商号180个,三江商帮的丁敬臣接替傅炳昭出任会长。丁敬臣与日本人保持了适当距离,而山东掖县商帮的刘子山快速崛起。

刘子山早年家境贫寒,曾学习德语在德国商人的企业中工作。1910年他在青岛开办福合永杂货行及福合永、海西等窑厂。他还收购永利号汽车行与永利号铁工厂,经营汽车进口与客运。日本占领青岛后,刘子山资产规模继续扩大,他在青岛创办东莱银行,并在济南、天津、上海等地开设分行。

刘子山还在青岛大量购入地产,时人称之为“刘半城”。他与前文提到的傅炳昭、丁敬臣以及栖霞人李涟溪并称“青岛四大家族”。由于与日本占领当局关系不佳,丁敬臣在后来的青岛总商会选举中失利,会长之位被刘子山控制的东莱银行总经理成兰圃(黄县籍)获得。

1922年青岛主权回归后,掖县商帮的实力继续增强。除了垄断青岛的草辫业,掖县商帮在服装(如掖县人刘锡三创办盛锡福)、手工业也大有作为。掖县人王乡斋兄弟开办的义聚合钱庄(中山路82号)吸收存款的能力居青岛之冠。上世纪20年代后,掖县帮还垄断了青岛的杂货业。

除刘子山,宋雨亭是掖县帮另一重量级人物。宋雨亭1884年生人,13岁来青岛读中学,后进入其四叔开办的瑞记商行习商,同时学习英语、德语。之后接任瑞记商行经理,后兼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,德占时期出任中华商务总局董事。宋雨亭筹建了青岛掖县同乡会,之后又出任胶澳电气董事和私立青岛大学校董。1927年,青岛总商会进行了第六届改选,宋雨亭当选会长,此时在会商号增至372个。宋雨亭在会长位置上一干就是10年,任期居历任会长之冠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青岛各大商帮在合作竞争中,大致划分了各自的“商业领地”。如属于三江商帮的宁波帮(会馆旧址位于今定陶路小学),在三江帮垄断青岛服装业的背景下,宁波帮不仅做大了西装业生意,还为青岛人带来了亨得利、宏仁堂,同时开创了青岛历史上的多个第一。如当时中国最大的冰蛋厂——茂昌、青岛最早的华人照相馆——天真照相馆等。

除了商业活动,由于当时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缺失,商帮同乡会组织发挥了管理、教育作用。比如凡有粤籍老乡有困难,广东会馆保证没饭管饭,没衣发衣,如失业便帮助找工作,想回乡则资助路费。商会还出资兴办学校,广东会馆还在双山购买15亩土地建立广东公墓,用以安葬粤省人士。各个商会还会不定期组织游艺会,为赈灾等事项筹款。

动荡与新生 续写新的商业辉煌

全面抗战爆发后,日军于1938年再次侵占青岛,三大会馆的运行受到影响,齐燕会馆甚至被日军征收变成了兴亚俱乐部。华商遭到日本的掠夺欺凌,利益受到严重损害。民族危难之下,商人群体的表现呈现出两面性。

傅炳昭、刘子山等人避居外地,日军查封宋雨亭资产,迫使其出任青岛维持会会长。宋雨亭严词拒绝并携家眷逃往上海,靠做小买卖维生。丁敬臣则投靠了日本人,获得了青岛的煤炭、食盐等产品专卖权。

此外,青岛救济院理事长邹道臣、义聚合钱庄副经理王乡斋、谦祥益副经理时品三、崂山烟草常务董事乔智金等人也在日伪部门出任职务。

抗战胜利后,丁敬臣等人因汉奸行为被捕。因战争而停摆的三大会馆及各地商帮准备“再开张”,但“财富神话”难以再现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老字号们迎来新生,公私合营的盛锡福、谦祥益、亨得利成为一代青岛人的记忆。随着中山路片区的复兴,大量华商在青岛的故事被挖掘出来,与大鲍岛、老街里的一座座老建筑奏响历史的二重奏。

那段承载着无数财富梦想的商帮往事,伴随着历史的脚步成为青岛城市的一段记忆。动荡时局下的商海沉浮已成过往,如今的青岛依旧是一片充满财富梦想的热土,来自海内外的商人乘着时代发展的大潮,在青岛续写着新的商业辉煌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